

第二十八輯

中华书局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八辑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文字研究. 第28辑/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10
ISBN 978-7-101-07588-5

I. 古… II. ①中…②中… III. 汉字-古文字学-文集 IV. H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2369 号

书 名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八辑
编 者 中国古文字研究会 中华书局编辑部
责任编辑 陈 乔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9½ 插页 2 字数 83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7588-5
定 价 98.00 元

目 录

王蕴智:从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看中国文字起源的多元性	1
游顺钊:古汉字形训与构形制约	8
刘一曼:论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刻辞甲骨	17
裘锡圭:释“𠂔”	25
张玉金:释甲骨文中的“𠂔”	36
郭静云:释甲骨文“𠂔”字	41
何景成:试释甲骨文的“股”	42
张新俊:殷墟甲骨文“臀”字补论	49
周忠兵:说甲骨文中“兮”字的一种异体	59
罗 琨:释“帝”	66
朱歧祥:说“争”	73
孙亚冰:“衍”字补释	77
刘 源:从殷墟卜辞的“族”说到周初金文中的“三族”	85
罗运环:甲骨文金文“鄂”字考辨	92
黄天树:商代甲骨金文中的同义词连用	100
郭永秉:谈古文字中的“要”字和从“要”之字	108
崎川隆:“字排特征”的观察对殷墟甲骨文字体分类研究的重要性	116
刘风华:《小屯南地甲骨》2667 版与历草类	123
蔡哲茂:新缀甲骨二十则	131
蒋玉斌:《甲骨文合集》新缀十二组	153
门 艺:黄组龟腹甲新缀七组	159
林宏明:利用缀合更正卜辞释文举例	164
曹定云:《英藏》2674“家谱刻辞”辨伪	169
林小安:正确运用《说文解字》考辨甲骨文刍议	180
严志斌:商代铭文青铜罍的时代	184
张懋镕:金文所见商周之际诸兄地位的变迁	193

雒有仓:商周青铜器铭文“舟”与舟人族系研究	198
叶正渤:周公摄政与相关铜器铭文	206
陈 絮:“仲催父鼎”补释及其相关历史问题	212
邓佩玲:新见颂父铺与西周杜国古史探论	218
朱凤瀚:射壶铭文考释	224
商艳涛:西周金文中俘获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236
徐广才:从出土材料看古代的“射鱼”之礼	241
李家浩:读金文札记两则	246
周宝宏:商周金文考释四则	249
王 兰:金文札记四则	256
赵 莹:读金札记二则	261
麦里筱:簠字构形分析与簠形状之争议	265
张永山:金文中的“陶”与“陸”	271
董莲池:西周金文几个疑难字的再研究	275
刘 桓:重释金文“摄”字	284
罗卫东:珣生诸器“𠄎”、“𠄎”字余释	289
张桂光:商周金文判断句略说	294
武振玉:殷周金文动词类释	299
陈英杰:金文字际关系续辨(二则)	304
赵 诚:关于“鸟虫书”	311
曹锦炎:鸟虫书铭文考释(二则)	321
徐少华:童丽公诸器与古钟离国历史和文化	326
蔡运章:昭宫铜鼎铭文考释	332
程鹏万:曾姬无卣壶铭“吾宅”二字补释	336
张振谦:司马楸编铸考释	341
韩自强 刘海洋:首见燕王唫铭文兵器	345
吴良宝:谈韩兵监造者“司寇”的出现时间	347
周 波:战国文字中的“许”县和“许”氏	351
黄锡全:介绍两枚楚官玺	358
萧 毅:楚玺考释二则	365
程 燕:《古玉印集存》释文校订	370
秦晓华:晋系货币地名试释三则	379
陈 伟:车舆名试说(二则)	384
李守奎:包山司法简致命文书的特点与 138—139 号简文书内容的性质	389

彭裕商:郭店简《老子》与今传本对读随记(二)	396
牛新房:释郭店楚简《老子》中的“御”字	400
李天虹:郭店竹简《穷达以时》篇 14、9 号简再读	404
沈 培:从语法角度看《缁衣》在流传过程中的改动	409
孟蓬生:试释楚简《缁衣》中与“表”字相当的字	419
陈家宁:说简狄所吞的玄鸟之“卵”	426
范常喜:上博简《容成氏》和《天子建州》中“鹿”字合证	431
连劭名:楚竹书《融师有成》新证	435
史杰鹏:释上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中的“迥侑”	438
陈伟武:上博简第七册释读拾遗	443
徐在国:谈上博七《凡物流形》中的“誓”字	449
宋华强:上博七《凡物流形》释读札记(二则)	452
杨泽生:楚竹书《问日》章新释	457
冯胜君:上博七《吴命》9 号简“望日”补说	461
禰健聪:说上博《吴命》“先人”之言并论楚简“害”字	464
王 辉:也说清华楚简《保训》的“中”字	471
沈建华:清华战国楚简《保训》所见商代先祖史迹传说	475
徐义华:清华简《保训》“假中于河”解	482
房振三:清华简《保训》篇“咸顺不成”解	492
顾史考:“𠂔”字读法试解	496
广濑薰雄:释“卜缶”	504
张世超:“采”、“秀”形音义新探	510
白于蓝:释“𦉳”	514
张富海:说“𦉳”、“冤”	521
高 智:古文字“也”、“只”形义关系解析	524
田 河:谈谈楚简中两个从“只”的字	530
魏宜辉:论战国楚系文字中省体之“𦉳”字及相关问题	535
孙伟龙:“幾”、“𦉳”二字异同考辨	540
李 锐:读楚简札记	547
萧圣中:《周易》古经简本、帛本及通行本丛札十则	551
田 炜:新见西汉马病以家钁铭文考释	556
施谢捷:新见秦汉官印二十例	560
杨 华: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第 25—28 号补说	567
黄文杰:秦至汉初简帛三种文献异构字初探	572

刘 钊: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校释札记	580
魏慈德:马王堆帛书《周易》经文照片校正	587
廖名春:帛书《五行》篇“西下子轻思於翟”段新释	594
王 晖:汉简“薄土”考辨	603
王志平:也谈“銛𦍋”的“𦍋”	611
叶玉英:“戴”字古音考	620

从双墩文化刻画符号 看中国文字起源的多元性

王蕴智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安徽蚌埠吴郢乡双墩村,普查到一处淮河流域独具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986、1991和1992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该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在遗址东南侧凹沟内被填埋的文化堆积层中,发现了一系列具有表意功能的陶器刻画符号,其年代距今有7300—7100年^①。

1989年,徐大立先生在吴郢乡双墩遗址试掘工作的基础上,发表了第一批出土于该遗址的陶器符号资料^②。20世纪90年代初,笔者曾关注到这批符号,并撰文对新披露的146例59种双墩刻画符号作有摹记(见图一)^③。



图一 双墩遗址1986年发掘所见陶器符号

2008年,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双墩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比较详尽地登记、描述了633件出土于该遗址的陶器符号信息,并刊布了其中成形较好的照片、拓片和摹本资料^④。这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地看到双墩符号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及其结体特征。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的结体方式,可简要列示如下:

常见象形符号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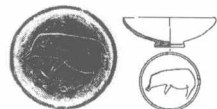
1. 86T0820③: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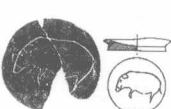
2. 86T0720②:103



3. 86T0720③:90



4. 86T0720③:70



5. 93 征集品:2



6. 91T0620⑬: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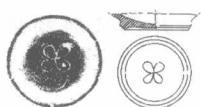
7. 91T0719⑮:34



8. 93 征集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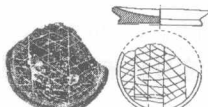
9. 86T0820③:8



10. 86 发掘品:103



11. 92T0723⑮:20



12. 92T0521⑱:21

常见几何形符号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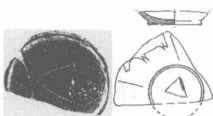
13. 91T0819⑭: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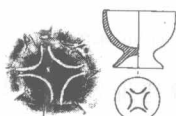
14. 91T0621⑩: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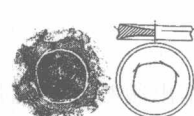
15. 92T0723⑰: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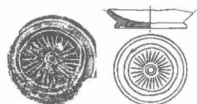
16. 91T0719⑬:43



17. 92T0722⑳:38



18. 92T0723⑰:36



19. 92T0723⑰:23



20. 92T0721⑱:36



21. 91T0719⑱:58

组合式符号举例



图二 双墩文化刻画符号结体方式举例

双墩遗址在上述三次发掘中共计出土陶器刻画符号 600 余例,其发现数量之多,在以往的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从考古类型学上考察,双墩遗址地处淮河流域中游地区,是一处独具文化内涵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双墩符号在时代上晚于出自中原地区的裴里岗文化贾湖符号,但比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器符号都要更早一些,而且彼此的文化面貌各不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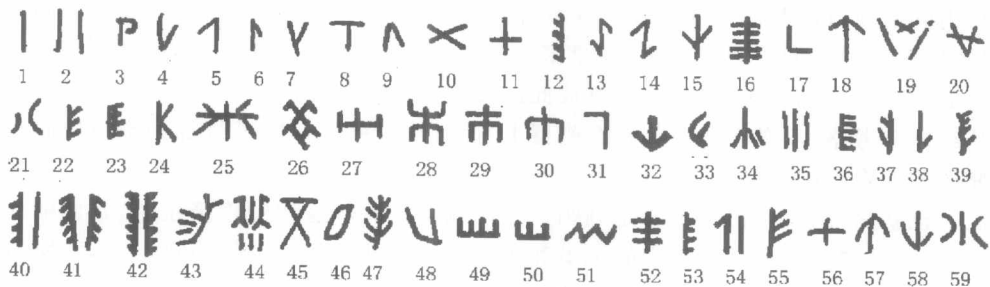
从载体上考察,双墩符号皆刻画在陶器上,而且绝大多数双墩符号都刻画或压画在双墩先民使用过的陶碗的外底部圈足内,只有少数符号刻画在陶豆圈足内或其他平底器的底部等部位。也就是说,双墩符号主要是刻画在实用陶器外底部这样的隐蔽位置,它们的作用不在于装饰,而是被赋予了具有特定的记事和表达概念的功能。从刻划痕迹上看,双墩符号大都是在陶坯烧制前刻画或压画上去的,也有少数刻痕较浅,或呈不规整状,乃在晾干的坯胎上或烧制成器后所刻。另外还见有少量似用剔刻或模印方法在陶坯上形成的阳文符号。双墩遗存中还存在有陶坯干透前后分别刻画的现象,即先把某种独立的符号作为主纹或底纹刻好后,再将另一种符号叠压补刻上去而成形。该遗址出土的骨锥、角锥和有锋利刃口的骨片,可能是刻画时所使用的工具。

在构形特征上,双墩符号大致可分为象形、几何形和组合形等多种结体方式。其中的象形符号共计 110 例,这方面包括有鱼、猪、鹿等动物形和植物形的符号^⑤,它们最具双墩文化特色。其余更多的是以三角形、菱形、半方框形、十字形、网格形、弧圈形等为主的符号,这些几何形的符号重见比例较高,而且有繁简之别,表明在当时的先民中有比较广泛的认知程度。双墩符号的结体看上去比以往各地出土所见史前刻画符号更为复杂多样。其中有些属于简单抽象的记事或记数符号(如图一:1、7、10、11、12、15、36 等例),但更多的符号则独具特征。其造型取材广泛,刻画技法娴熟,线条方圆兼施而富有变化。通过一些较为复杂的符号,还表现了如编织、渔猎等具有生活意义的内容,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原始文化的风貌。

应该注意的是,双墩符号中已出现了部件组合式的构形,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符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一定的特指意义。如上揭图一:40 就可分别与图一:8、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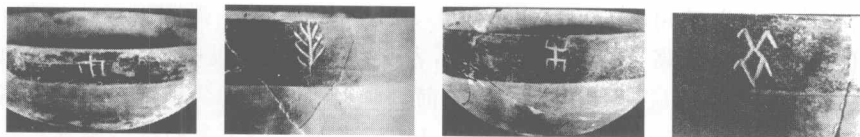
33 和与图一:2、7 相组合,图一:41、42 则是两种使用若干符号固定组合的例子。这样的繁复结构在各地出土的史前符号中是不多见的。总的说来,双墩符号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构形系统,具备了构成文字的某些基本要素及其特征。其在结体上与目前所见新石器时代中后期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各类远古符号相比,都是比较先进的。下面我们就以它们为例作些比较。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仰韶文化重要遗址之一的西安半坡村,发现了一系列陶器符号。这类符号前后在同一文化类型的陕西、甘肃、河南等 10 余处遗址中都有发现,其年代距今约五六千年。仰韶文化符号也有自己相当固定的刻写习惯,它们大都是以尖削状的器具刻划在钵形器外口沿的黑宽带纹上,而且一器只刻一个符号。仰韶文化符号中同一符号重复出现的频率较高,这一点和双墩符号近同,其相同或相似的符号归并起来,大约可得 70 余种。从符号的构形特征看,它们是以简单线条的排列穿插组合为主,象形的意味较少(参见图三)。



图三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

图三:1—25,西安半坡,参《西安半坡》197 页图一四一;26—48,临潼姜寨,参《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15 页图三;49—51,宝鸡北首岭(彩绘),《考古》1979 年 2 期,图版贰·4;52,长安五楼;53,邠阳莘野;54,铜川李家沟,《考古与文物》1980 年 3 期,15 页图四;55,临潼垣头,《考古与文物》1982 年 1 期,3 页图五;56—59,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层),《文物》1983 年 11 期,25 页图十五、十六。



图四 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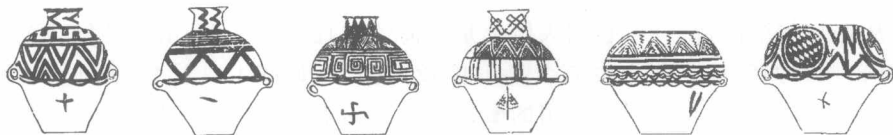
分布在黄河上游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等地的马家窑文化,在年代上晚于仰韶文化。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人们就在甘肃半山和青海马厂两种类型遗址所收集到的陶壶和陶罐上,发现有 10 种用颜料描画的符号。1974 年至 1975 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青海东部柳湾马厂类

型墓葬出土的 697 件殉葬彩壶的下腹部,发现有用颜料绘写的符号,每件器也是只画一个符号,计 130 余种(参见图五)。



图五 马家窑文化陶器符号

1—10,甘肃半山、马厂,《中国古生物志》丁种第 3 号 1 册 178—179 页;11—88,青海乐都柳湾,《青海柳湾》161—162 页图九三、九四、九五。



图六 马家窑文化陶器符号图例

马家窑文化符号有部分形体与仰韶文化符号相近,另外还有一些以几何状为主的构形与双墩符号相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青海乐都柳湾符号,其在数量上并不比双墩符号少,有些符号在不同器物上反复出现,并且都有固定的位置,同样反映出它们不是随意的描写之物,很可能是制器者的专门标记或带有族氏花押性质,具有一定的流通性。与双墩符号不同的是,柳湾符号都是在器物制成并干透后,用毛笔之类工具蘸上颜料绘写上去的,而且彩绘符号的复杂性以及书写的位置都与双墩符号有别。

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史前陶器符号的遗址,比较重要的有湖北宜昌杨家湾、清水滩、柳林溪等处。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大溪文化,年代在公元前 4000—前 3400 年之间。1981 年,考古工作者在杨家湾遗址出土的高圈足彩陶碗、陶钵的外底部,发现有 50 多种刻画符号,兹择要摹写其中的 41 例(见图七:1—41)。在此之前,还在宜昌清水滩遗址发现有数种陶器符号,其中时代偏早的属于大溪文化系列(见图七:42、46),晚期的刻画则属于屈家岭文化遗存(见图六:43—45),年代在公元前 2800—前 2600 年之间。



图七 大溪文化(附屈家岭文化)陶器符号

图七:1—41,宜昌杨家湾,《考古》1987年8期,763—764页;42、46,宜昌清水滩一、二期;43—45,宜昌清水滩三期(属屈家岭文化),《考古与文物》1983年2期,9页图十一。

大溪文化的刻画符号,一般都集中在器物底部的隐藏部位,这一特征与蚌埠双墩符号的刻画习惯相近,不过杨家湾等遗址出土的大量彩陶及刻画风格似乎又与仰韶文化存在着渗透关系。从符号的结体特征看,它们大体上是以简约的直笔为主调,由单纯线条的折合交错而成,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其中也有个别形体较为整齐,如图七:31、42诸例,其轮廓分明,富有图案装饰意味,似为某种固定使用的徽识。但总的来说,大溪符号所使用的斜笔和直笔较多,刻划短促纤劲,明快利落,而且较为随意。大溪符号延至屈家岭文化时代,历经千余载而自具特色,是长江三峡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研究华夏远古时期的文明,迫切需要探讨文明起源的问题,而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文字的出现。汉字的起源是个古老的命题,这一命题至今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我国古代颇流行黄帝时代仓颉造字的传说^⑥,宋代学者郑樵曾提出书画同源、“六书者,皆象形之变”的学说^⑦。近代以来,仓颉造字说已不为学者所宗,大家多倾向文字起源于图画的观点。至于国际学术界,尤其是西方人,因为不足以了解中国文字的源始,他们或把汉字错误地看成是由外域传入的,非源于本土^⑧,或是简单地把汉字起源的绝对年代定得偏晚^⑨。最近几十年来,我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且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远古时代的符号遍布祖国各地,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开拓了新的思路。

上文我们只是拿双墩符号和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符号、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符号作了简单的比较。同样,我们也可以拿双墩文化符号与独具文化内涵的大汶口文化图像符号、小河沿文化陶器符号、良渚文化陶器符号进行比较。我国各地出土的史前远古符号还有很多典型材料,通过它们不难看出,各地出土的史前远古符号,有的已具备了构成文字的某些基本特征,可以纳入汉字演进的历史轨迹上来考察,但它们与汉字的正式形成似

乎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还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

在我国幅员辽阔的大地上,远古先民曾经走过了从结绳记事、符号记事到发明文字的漫长历程。今所见各史前符号地域色彩浓重、背景复杂。如大汶口文化图像符号,邹平丁公、高邮龙虬庄的“陶书”,太湖流域良渚文化陶器上那些排行连刻的符号等,都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又如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陶器上的𠄎形和安徽凌家滩墓葬出土的玉版符号,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具有一定的流通性。在不同时空、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许多富有生命力的符号,有的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瞬间浪花,有的则可能融汇到汉字产生的主流道路上来。今天看来,中华文字的起源与演进过程并不是一条单纯的主线,发明文字的人物也远远不止一个仓颉。双墩符号所反映出来的文化面貌及其特征,同样使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字起源的多元性。

注:

- ①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4页。
- ② 徐大立:《蚌埠双墩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247—255页。
- ③ 王蕴智:《远古陶器符号摹记·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刻画符号》,《书法报》1994年3月16日(第11期)第2版;又见拙作《史前陶器符号的发现与汉字起源的探索》,《华夏考古》1994年第3期,第99页。
- ④ 该遗址陶器符号的登记信息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附表二和附表三(第480—496页),陶器符号的拓片和摹本资料参见该报告的第五章和第六章(第183—398页),照片资料参见该报告的彩版二八至彩版八八,科学出版社2008年。
- ⑤ 双墩遗址1991—1992年发掘出土象形符号59例,1986年出土象形符号51例。参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五章,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22页和第184页。
- ⑥ 古代典籍里有许多关于仓颉造字的记载,例如《世本》:“仓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云:“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荀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韩非子·五蠹》:“仓颉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诒。”《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 ⑦ 参见郑樵《通志·六书略》。
- ⑧ 参见 I. J. Gelb: A Study of Writing 第98页图表54,美国芝加哥大学,1963年。
- ⑨ 参见 Senner, M. Wayne: The Origins of Writing,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1989年。该书把汉字起源的绝对年代断定在公元前1200年。

古汉字形训与构形制约

游顺钊

前言

本文引用的形训例字大都是较富有文化内涵的古汉字,其中一部分曾在年前发表的几篇拙文里探讨过。文中提及对这次讨论起过启发作用的两种手语,一种是通用手语,另一种是笔者在加拿大北部和中国农村调查的离群聋人自创的手语^①。至于古代手势,则与聋人无关。因技术问题未能把本文所举的七十多个古汉字印出,谨此致歉。然所举均为大家所熟悉的古汉字,故应无碍诸位审核本文文意。

一、古汉字形训

(一)形训辖域与对象

王宁(1996:103—9)对形训的界说、特点和预期结果的讨论很有提示性。她认为:“只有形训的造意训释,因其显示造形意图,是字所独有的……与字形相贴切的意义训释叫形训……形训如果没有造意部分,就失去了它的特点而成了义训。所以典型的形训,还应当是字训……形训表明依义造字的意图,一般是说明本义的……本义就是词的某一个义项,或某一义项在个别事物上的具体化。”

形训对象,当然应包括全部有形可析的古汉字,即传统称作象形、会意、指示等字的构形。至于形声字的形旁,原则上已不用去分析。若要分析,则应在它用作形旁之前处理好。形旁,即日后在语义上把字汇归类的部首。所以这种形旁都不是为某个形声字而专设的,而为其同类词所共用,例如妹字、河字的左边偏旁。剩下的声符部分,则属于音韵学的范畴,更与形训无关^②。

然而古汉字构形的偏旁的分类作用外,是否会同时充当义符就得细察。例如稍晚的小篆聃字的耳旁就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选中耳字作形符或作声符呢?它右边的心字的作用是什么?如说耳字是个纯声符,为什么后来又用止字声符去取代它呢?据我的分析,

无论耳字是否是声符,它和心字都同时兼作义符,心字这个字素标志字义是心理性的,而耳字这个义符后面,隐藏一个表示羞耻的古代手势^⑤。同样地,也要留意声旁的选择,像聾字里的龍,是否隐藏着取象的意图(见下文)。可见形声字的结构也不一定与形训无涉。

(二)形训目的

顾名思义,形训的首要目的是探取古汉字造字的初义,并借以增补对同源词的认识。与此同时,亦希望能窥探我先民造字中所反映的形象思维和其中保存着的夏商文化信息。

1. 古汉字中蕴藏之夏商文化信息

古汉字蕴藏着待发掘的夏商文化信息,有些可以印证文献上的资料。例如“和谐”的和字,在甲骨文是从龠,象征一种排管乐器,引申为声律的和谐。西周人就是按这声律的和谐提升出“声一无听,色一无文”的哲理。

甲骨文里有好几个字是用鹿字构成的,例如麗字、陷字、麓字、慶字和稍晚的廛字。这都反映了鹿在夏商人生活上和心目中的地位。一方面,鹿是那时田猎的重要和常捕获的猎物。这可以从陷字、麓字、廛字反映出来,是鹿被用来概括所有其他的动物或猎物。《说文》把廛字训为“鹿行扬土也。从麤从土”。能扬起土的动物有的是,可造字人对鹿字却情有独钟。鹿被选作麗字的构件显示鹿皮那时备受欣赏。跟麗字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慶字,鹿已变成一种吉祥的象征。也许因为那时候人们把长颈鹿认作麒麟^⑥。还有两个较常用的字,牡和逐,也有写作从鹿的。从鹿的逐字,使我们联想到“逐鹿中原”这句令古往今来多少英雄人物折腰的话。

聖字在甲、金文字形里都很夸大耳朵这个构件,因此有人认为这可能表示所谓圣人能聽到上天的声音以通神明,并用这个形训去释读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两句话^⑦。然而谓圣字的那个耳朵表能通神明,似太欠说服力。孔子不是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吗?

此外,婦字、朕字、帝字,就算在形训上大家一时未能取得共识,其中有关夏商的文化内涵定是很丰富的。再如象字和相字间的关系,也反映了我先民造字时的形象思维。这些信息都是在一般文献里找不到的。我曾专文论证过甲骨文里这几个字,于此不再赘述了^⑧。

2. 古汉字形义之旁通

本节的阐述将以旦字为例。这是按读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366、54页)时得到的启发,顺藤摸瓜写成的。陆、王两位认为形训与探讨同源字无直接关系,只可能为之开路和给探讨词义的源提供线索。例如从旦字的形训,可以意会到袒字衍生的构形诱因,然而不能据此进而对綻字作形训,只能配合音韵和语义才行。

从旦字、袒字、綻字等这组同源词,可以离析出一个共同义根:露出、显露。旦字之所以成为这组同源词的一员,是因所描述太阳“破晓”现象属于这组同源词的语义范围^⑨。然而这组同源词的主体,不一定像旦字里的太阳那么圆的。所以这组的同源词,可以包括綻字、袒字、坦(坦白)等字,而其共同语义“露出”却不受主体形状的牵制。例如綻字的线状或条状的

破裂义,袒字的身体部分裸露义,乃至坦白的坦字的没形状的抽象义等,都并不妨碍其从旦^⑧。另一方面,由于旦字里的太阳形状给人们深刻而广泛的印象,因此它在这个同源词组又衍生一个小分支,像胆字,俗写的蛋字(以旦字代虫字),都被用作形符兼音符^⑨。

(三)形训之印证

王宁(1996:103—4)提出“结合词义来阐释字的构形意图”。她认为形训应包括两方面:“实义”(在语言中确曾使用过的意义)和“造义”(造义训释)。形训指造义的本义。例如末字,《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習字,《礼记·月令》“鷹乃學習”(见陆、王 1994:109)。这种印证需要我们掌握好文献资料,作为形训的补充资料。例如,取字(指战争获馘),宋郑樵《六书略》:“取,《说文》:捕取也。周礼获者取左耳,故从又从耳。”也许这也算是“造义”与“实义”间的一例吧。这其实可以理解为形训的印证问题。能做得好,形训这个关固然就把握得严,可是这个标准可能定得太高。例如陆、王两位提出的習字,我自问无法从甲骨文習字里那片羽毛领会到文献里“学”的实义。与其说这是实义印证了習字的造义,毋宁说是文献的“学习”实义启示了如何去领会習字的造义^⑩。

二、商代文字系统

传统的象形字是个理想的分类。也许在一些图纹性的铭文里,名副其实的象形字曾存在过,例如粗笔铭文里的一些动物字汇的四蹄踏地、重心向下、惟肖惟妙的猪字、象字、鸟字、牡字。这与商殷甲骨文所见的却有很大差距。殷商的文字已远离图画文字。甲骨文里所谓象形字,除了像箭字、豆字、车字、门字、田字、鱼字、龟字等外,大都不是看图识字,一目了然的。绝大部分的象形字都要猜想、推敲。例如为字,长期以来受《说文》的误导,错认作母猴;再如人体的字汇,像鼻字、趾字、金文的手字也不是很容易猜得出来的;人字表面上似乎很简单,可是头一次碰上,也很难肯定是人的侧影。说它像猿人也未尝不可。再如男字和女字,就要从男的耕作和古代女性的休息体态去领会这两个字造字意图。看来学者们当初隶定这些字时,定要靠上下文和语法的制约去领会,或者利用文献资料的协助。

商代的甲、金文已称得上是个较完备的文字系统。从字形看,它已完成了文字的笔画化;在使用上,也与口语的语音和语法挂钩,并已在有上下文的语境中运作。阅读的某些“潜规则”亦已为当时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所掌握。例如甲骨文里已出现“纵变”,那是说,把字里的一些本应平摆的物象竖起来,例如动物字汇中的猪字、象字、虎字,器具字汇中的匕字、匡字、广(月)字^⑪。若与参照物对比就可看到它们的形象在文字演化过程中,已发生了纵变,变得不合“常理”。然而这却表明当时对阅读和刻写这些字已有共识和接受这些字体的纵变,要不然,就会出现困难、混乱或者误会^⑫。

今天我们在古汉字形训所遭遇的困难,就是因为历史上的脱节,缺乏这种共识和造形意